

* 書評論文 *

兒童與中國現代性

徐蘭君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 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
By Andrew F. Jon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72.

本書對現代中國文化史中的「進化論思維」及其內在張力和自相矛盾作了考古學式的細緻梳理，揭示生物進化論（包括法國的拉馬克 [Lamarck]、英國的斯賓塞 [Spencer] 及達爾文等）在十九世紀末如何被翻譯介紹進中國，並辨析其不同文學形式和大眾知識領域的散播，從而凸顯其如何有效地改變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想像，同時也悲劇性地限制他們的思想視野。他追溯進化式的敘事思維如何成爲一種消融野獸與人類的界限，並且在兒童的成長與文明發展之間建立同構關係的「本土知識」(vernacular knowledge)，並在此過程中勾勒出受困的中國如何在世界體系裏掙扎著獲得一席之地。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提出，近年來不論在歐美的漢學界還是亞洲學者的研究中，關於中國文學「現代性」議題的研究著述甚豐，但對於文學「現代性」此論題本身所依賴的進化論式的邏輯思維和認知結構缺乏必要的審視和反省。在筆者看來，在對於中國文學現代性反思之上，且進一步地，對於其自我定位及學科能加以反思，正是本書尤爲可貴之處。本書對學界的貢獻可以由不同角度切入，本評論將著重分析其對現代中國的「兒童發現」與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發展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童話文類的意義、玩具工業的興起、兒童啓蒙書籍及教科書的出版等議題的諸多貢獻。同時，爲了釐清本書的對話語境，本文也對近年來中西學界，尤其是在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研究領域中，所興起關於兒童與中國現代性之關係的研

究，作一個大概的梳理。

作為歷史的兒童與現代民族國族話語之間關係

關於本書的緣起，作者曾在一次訪談中提及昔日任教於華盛頓大學的東亞圖書館的某個下午：「就在那個下午，我偶然讀到了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一本從心理學角度來談兒童繪畫的書，作者是黃翼。這恰巧很適合成為我所要談論的問題的『引子』。於是我首先分析了書中的一些兒童畫，探討這些兒童畫所展現給成人讀者的矛盾——兒童畫作裏面不經意帶出的具體歷史性內容，與作者黃翼所運用的普遍發展主義話語框架之間的矛盾。此即成為《發展的童話》(Developmental Fairy Tale) 第三章的開篇，也是我最早寫成的部分。從此我就順著一條獨特的知識軌跡，一直摸索了下去。」¹ 在這一篇題為「作為歷史的兒童：民國時期一種發展的話語」的文章中²，作者主要分析了二〇到三〇年代中國知識分子通過小孩而實現中國現代化的種種嘗試和努力。值得注意的是，他重新解讀魯迅被譽為中國現代小說起點的〈狂人日記〉，並對小說末尾「救救孩子」的呼喊賦予嶄新的闡釋：不再解讀為單純的希望的形象，而是一種悖論式的存在和敘事結構上的雙重否定。這充滿深刻曖昧性的對立結構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系列與實踐教育學及社會組織結構相關的問題：我們要如何做才能把兒童從他們父母的文化「污染」中重新解放出來？在兒童成長的過程中到底在哪一個點上開始進入文化？革新性的教育干涉有可能嗎？或者說，到底要如何才能把兒童從令人窒息的傳統及大人的專制中解放出來？這些問題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曾在《新青年》這樣的雜誌上被充分討論，並且提出例如激進的社會重組或教育改革之類的意見。但魯迅在他早期的小說文本中已明確暗示這些烏托邦設想不可避免的失敗，以及要與傳統文化徹底斷裂是不可能的。在作者看來，為了解析國族話語論述中這種充滿內在張力的自相矛盾 (antinomies)，可以從兒童與野獸這兩個核心意象入手，尤其是前者 (p. 5)。兒童的成長通常被理解或比擬為人類從野蠻被啓蒙到文明的進化過程，也正因為如此，作者分

¹ 安德魯·瓊斯 (Andrew F. Jones)，文貴良：〈進化論思維、魯迅與近現代中國——安德魯·瓊斯教授訪談錄〉，《現代中文學刊》2012年第2期，頁4。

² Andrew F. Jones, "The Child as History in Republican China: A Discourse on Development,"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 (Winter 2002): 695-727.

析進化論在近代中國日常生活中的本土化時，特別選取近現代中國在兒童學領域的一些新近發展，例如兒童研究的學科化、教科書出版業的興起以及現代文學中的兒童書寫。在論述中所選擇的材料方面，作者特別去挖掘那些通常被忽視的兒童教科書和刊物，以及兒童文學這個文類。事實上，作者在他的第一本書 *Yellow Music: Media Culture and Colonial Modernity in the Chinese Jazz Age* 中剛好也有一章涉及《小朋友》雜誌的主編黎錦暉，並對黎錦暉從編輯兒童刊物及提倡用兒童劇音樂推廣國語教育的貢獻進行了有意思的分析。

如果「發展」是本書的關鍵字，則「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 是另一個核心概念³。這是他從 *Yellow Music* 就開始使用的概念。「殖民現代性」一詞所帶來的是對發展話語所處的「不平等國際體系」的敏銳揭示，並視之為一種「跨語際的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⁴。在全書的論述中，作者時時注意進化論話語在原來產生語境中的涵義及其在中國特定語境中本土化後所產生的種種變異。也是在此框架下，作者特別提出發展的主動性 (transitivity) 和能動性 (intransitivity) 之間錯綜複雜的張力：「中國知識分子有很強的使命感，致力於主導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他們自然非常想知道：歷史的發展到底是否可控制？發展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還是靠意志、欲望和使命感來實現？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在思考這些問題時，總是糾結於對立的答案中。我在分析魯迅及其同時代話語時，一直就注意到這樣的對立。進而發現，其中某些發展式敘事在表徵形式上也呈現了對立的矛盾性，是能動性和非能動性在鬥爭的結果。這些作品裏面的故事往往最終走進了意義的死胡同，並走向自身的瓦解。」⁵ 這段話比較集中地體現出作者企圖在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史、現代中國大眾媒體文化史和中國現代文學領域建立一種跨領域的聯繫，而這種聯繫在同為思想

³ 這個概念最早是在 Tani E. Barlow 的論文“Colonialism’s Career in Postwar China Studies,” *Positions* 1 (Spring 1993): 224-267 提出。後來這個概念在她主編的 *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中有更進一步的闡述。關於半殖民化語境對於中國作家的創作及其對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影響，史書梅在她的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中有比較集中的一些討論，尤其是在序言中。

⁴ 此概念的具體涵義，請參考 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⁵ 安德魯·瓊斯 (Andrew F. Jones)，文貴良：〈進化論思維、魯迅與近現代中國——安德魯·瓊斯教授訪談錄〉，頁 6。

家和作家的魯迅身上找到最好的答案。當然，這種跨領域的努力也體現在作者對魯迅的雜文和小說的並置閱讀，以及將這種閱讀始終置於半殖民地的文化場域中。

這本書的緣起引發如下疑問：我們該如何理解「兒童」成爲作者切入中國現代文學直至中國現代性一些核心議題的方法？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從「兒童」概念本身的文化內涵切入。在考察中國現代文學和文化如何爲現代這個問題時，女性和民眾（更具體的說是農民）經常是學者切入的主要群體，而「兒童」相對非常地邊緣化。與性別身分和階級身分不同，「兒童」身分不單屬於某個特別的群體，而是每個人某個特定時期都會短暫擁有的身分。Carolyn Steedman 在其著作中曾經討論和分析十九世紀英國圍繞著「內心(interiority)是一個孩童」這一文化想像的文學、科學及社會話語系統，從而辨析這一歷史時期對流逝過去的緬懷，對個人原初的執念，及對個人發展某些理想化的想像如何附著於兒童的複雜過程⁶。或者說爲了個人具有「歷史」和「深度」，「童年」如何被發現和創造出來。Steedman 指出，佛洛伊德爲了發現自我的主體性，爲個體創造出「童年」，並賦予其「潛意識」的概念。Claudia Castaneda 的著作則以兒童是各種文化建構的話語系統爲討論前提，將兒童的概念放在一個更大的、跨國的文化政治權力網路中考察其建構過程，其中包括離散、殖民、後殖民及科學等話語系統⁷。作者認爲，兒童概念的形成，是眾多價值系統發生作用的場所：作爲一個永遠處於「正在形成」(becoming) 此一狀態中的存在，「兒童」可以成爲對成人世界的一種反省或再創造。用 Castaneda 自己的話來說，「兒童是正在形成過程中的成人」⁸，是還沒完成卻有潛力成爲「成人」，正是這種中間性、可變性 (mutability) 和潛力性 (potentiality) 成爲「兒童」這個概念的文化價值來源。

一九六〇年，出版了法國學者 Philippe Aries 具有奠基意義的社會史著作 *Centuries of Childhood: A Social History of Family Life*。在這部著作中，Aries 指出，在中世紀的歐洲，特別是法國，人們並不承認兒童具有不同於大人的獨立

⁶ Carolyn Steedman, *Strange Dislocations: Childhood and the Idea of Human Interiority, 1780-19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⁷ Claudia Castaneda, *Figurations: Child, Bodies, World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⁸ *Ibid.*, p. 1.

性。Aries 的著作深入地探討關於家庭生活的現代觀念和對兒童本性的現代認識的歷史過程。他把「兒童」概念歷史化的努力對後來西方兒童史的研究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如果我們同 Aries 一樣把「兒童」的概念置於現代中國的語境之中，考察其發展的歷史脈絡，就會提出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兒童」作為一個有效的歷史和文化概念如何改變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中的性別、社會和政治想像？「兒童的發現」這個命題能為理解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的發展提供什麼新的切入角度？同樣地，當我們把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中的兒童問題不僅放在「兒童文學」的範疇裏，並且將之放在整個現代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語境中來討論時，它又將呈現出哪些新的研究意義？柄谷行人在他的《現代日本文學的起源》一書中提出：「所謂孩子不是實體性的存在，而是一個方法論上的概念。」⁹正是在這種方法論的眼光之下，孩子才成為可觀察的對象。目前西方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研究，已經有很豐碩的成果¹⁰，不在這裏一一介紹。

近年來對中國歷史和文化中兒童的關注和研究也開始逐漸增加，但大多數的研究集中於歷史學領域，尤其是古代中國¹¹。這些對歷史上不同時期兒童問

⁹ 柄谷行人著，趙京華譯：《現代日本文學的起源》（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頁124。

¹⁰ 有關西方文學及文化中兒童問題的研究，以下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英文著作：Boas George, *The Cult of Childhood*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6); Peter Coveney, *The Image of Childhood,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 Study of the Theme in English Literature*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67); Reinhard Kuhn, *Corruption in Paradise: The Child in Western Literature*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82); Hugh Cunningham,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Oxford: Blackwell, 1991); Naomi Segal, *The Adulteress's Child: Authorship and Desire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Novel* (Cambridge, Mass.: Polity Press, 1992); Virginia Blum, *Hide and Seek: The Child Between Psychoanalysis and Fic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Ellen Pifer, *Demon or Doll: Images of the Child in Contemporary Writing and Cultur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2000); Judith Plotz, *Romanticism and the Vocation of Childhood* (New York: Palgrave, 2001); Eric Ziolkowski, *Evil Children in Religion, Literature, and Art*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Catherine Driscoll, *Girls: Feminine Adolescence in Popular Culture and Cultural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Ala A. Alryyes, *Original Subjects: the Child, the Novel, and the N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¹¹ 近年來歷史學領域對中國兒童問題的研究情況，可以參考熊秉真的論文：“Treading a Different Path?: Thoughts on Childhood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Childhood and Youth* 1.1 (Winter 2008): 77-85。

題的研究為我們釐清中國兒童概念的形和變化打下堅實的基礎¹²。這裏主要針對明清時期的兒童學研究作一些梳理。熊秉真的英文專著 *A Tender Voyage: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在使用豐富的兒科醫學資料及家譜等材料上，對明清時期孩童歷史作出開拓性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熊秉真在序言中提出，帝國晚期的中國存在著三種主要想像兒童的方式：一是從生理學意義上來定義的兒童，認為兒童是個體生命的早期階段；二是從社會地位來定義，處於從屬位置的、通常被賦予「子」的稱呼的成員，如家庭結構裏年輕的相對於老年的，這通常與年齡無關；三是從哲學和美學意義上來定義，與「童心」說相關的「純真」的象徵意義。這三種區分對我們具體理解中國語境裏「兒童」的定義很有啟發性。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所有的研究都不會認同「兒童的發現」是到中國的近現代才產生。其實關鍵的問題並不是「兒童」在中國歷史哪一個階段上被發現，而是「兒童」這個概念在不同時期是如何被理解，以及產生變化。同時，上面的這些研究也促使我們進一步思考以下問題：(1) 兒童年齡定位的問題：如熊秉真在研究中所揭示的，不同歷史時期對兒童年齡的定義是不同的，而這可能涉及兒童教育概念的區別，以及對不同性別兒童的社會要求的差異；(2) 性別角度對我們研究兒童問題的重要性；(3) 兒童身分的暫時性：熊秉真曾提到兒童身分並不是終身的，它只是每個人生命的一個短暫階段。這也使得兒童這個身分與性別等區別開來。

在現代文學和文化領域，兒童的發現與現代民族國家話語之間的聯繫通常是學者切入兒童問題時關注的一個重點。當我們用現代國家民族的觀念來重組社會群體時，國家的概念與每一個個體建立起一種抽象的關聯。在這一關聯

¹² Anne Behnke Kinney 主編的英文論文集 *Chinese Views of Childho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是第一本對中國歷史上（從古代到現代）不同領域（包括歷史、藝術及文學）有關兒童和童年的觀念的梳理和研究，共收集十一篇論文，但關於現代文學及文化中兒童相關議題的研究比較少。本書的各篇文章對中國歷史上一些重要時期的兒童觀有不少有趣的發現，如對漢代時期的傳記書寫、漢代石刻畫像中的兒童形象及明清時期的殺女嬰現象等都有深入的探討。總體而言，這些論文在考察古代中國兒童文化時的切入角度深受 Aries 著作的影響，並且做了很多有意義的嘗試。而 Anne Behnke Kinney 本人所寫關於中國古代兒童書寫及歷史的英文專著 *Representations of Childhood and Youth in Early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則對中國早期歷史（從東周的春秋時期到漢代）的兒童概念及其話語進行深入討論。她所使用的材料包括這段時期的歷史、哲學及文學文本，以及近來在考古學方面的新發現。作者認為漢代是中國歷史上「兒童發現」的一個重要時期。

中，兒童概念的產生，就是一系列從具體到抽象，從經驗到理性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現代的兒童話語是那些為數不多的國家話語成功地自然化、合理化的概念之一。Stefan Tanaka 在其論文“Childhood: Natur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into a Japanese Space”一開頭就指出作為重要隱喻及象徵的兒童已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¹³。作者認為，兒童已經成為現代曖昧性和衝突性合為整體的一個擬人化場域。也就是說，一方面是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把兒童的自然發展抽象化，亦即將兒童的發展與基礎教育和現代國家福利制度的發展等聯繫在一起；同時，兒童自然生理上的發展又成為現代民族國家論述中一個很重要和經常被引用的隱喻，即從不成熟到成熟的生理發展歷程被用來解釋現代民族國家的產生與發展的抽象過程，使之直觀化和自然化。雖然田中所討論的是日本語境下兒童話語的發展過程，但對研究現代中國語境下的兒童話語也很有啟發性。

人類學學者 Ann Anagnost 的論文“Children and National Transcendence in China”¹⁴ 是考察兒童話語與中國民族國家意識產生之間複雜關係的重要文章。論文從當下中國社會在計畫生育政策等的影響下，父母對兒童不斷增加關注和投資的社會現象談起，考察更長的一段歷史期間中國的育兒實踐如何使得兒童逐漸成為民族拯救的希望所在。Anagnost 尤其關心後毛澤東時代急劇的社會經濟政治變化之下，城市中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對不同階級之間快速流動（尤其是經濟的發展使得毛時期所建立起來的嚴格的城鄉差別開始消解）所產生的焦灼感。以及這種焦灼感如何與中國二十世紀末的民族主義互相關聯。Anagnost 指出，在中國當前的人口政策下，兒童逐漸成為被「充分迷信化 / 偶像化的對象」(fetishized object)，不僅是父母，也是各種社會缺失欲望的轉移地 (a site of displaced lack)，從而也成為抵抗快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的價值保存場所。作者指出，在中國語境下，中國民族主義的話語總是集中在落後的農民與兒童這兩種身分上，而將兩者聯繫的是有關「人民素質」這

¹³ Stefan Tanaka, “Childhood: Natur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into a Japanese Space,” in *Cultures of Scholarship*, ed. Sarah C. Humphrey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7), pp. 21-56.

¹⁴ Ann Anagnost, “Children and National Transcendence in China,” in *Constructing China: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ics*, ed. Kenneth G. Lieberthal, Shuen-fu Lin, and Ernest P. Young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7).

樣的話題。當然，兒童與農民的不確定 (indeterminacy) 的特點使得他們總成爲討論民族教育的基點，而這種不確定性在啓示希望的同時也隱含著恐懼，尤其是當他們不按預定的軌道發展時可能會給威權性的國家及家庭結構帶來威脅性的衝擊。Anagnost 文章的主要部分是考察民國時期在半殖民地歷史語境下，中國兒童的身體如何與民族主義論述結合在一起。作者特別強調「半殖民地的歷史語境」可能爲中國民族意識的產生帶來一種悖論式的困境：一方面把中國納入世界範圍的現代性進程，同時其本身的殖民性又爲中國國家主權的建立製造不可能性。Anagnost 把考察的重點放在民國時期，原因是在她看來，這個時期與之前所討論的後毛時期在相關問題上存在許多可比的類似點，若要瞭解當下中國的兒童話語，我們必須先把歷史上有關兒童與民族國家話語之間關係建立的過程梳理清楚。在考察民國時期的兒童身體與民族意識興起之間的關係時，Anagnost 從魯迅的雜文〈上海的兒童〉到豐子愷的兒童漫畫，詳細考察在這段時期兒童是如何被描述及看待的 (the act of looking at the child)，以及爲何成爲各種企圖超越中國半殖民地困境的欲望投射點 (a certain fetishism of the gaze)。她在分析中凸顯豐子愷漫畫的中西混合性 (the hybrid quality)，也因爲如此，豐的漫畫不僅代表著一種具有普遍性的關於兒童的想像，同時還是現代和中國的；或者簡單地說，在這些兒童的形象中包含著近現代中國歷史，尤其是中國半殖民地歷史處境所帶來的獨特之處。

Anagnost 所討論的「爲何有關現代中國民族國家論述的話語經常以農民或兒童的身體爲隱喻」這一議題在周蕾的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一書中也有非常充分和深入的探討¹⁵。周對《孩子王》這部電影的討論很精彩，但在這裏我更注重她對「兒童」這一概念所作的理論化思考。周蕾指出，對於原初的興趣往往出現於文化危機的時刻，而中國現代文學正是通過對「原初」(the primitive)，例如奴隸群體、女性或孩童的攝取而轉向現代。她同時強調，「原初」是「文化」與「自然」的混合，並且是處在「第一世界」的帝國主義和「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之間「悖論式的存在」(paradox)¹⁶。而中國在身爲受害者的同時又是帝國的原初主義

¹⁵ Rey Chow,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¹⁶ *Ibid.*, p. 23.

的悖論，正是促使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感時憂國」的動力所在。

臺灣學者梅家玲近幾年來也對現代中國文學及臺灣當代文學中的兒童及「青年」話題做出非常有建設性的研究，尤其是關於「教育小說」的研究¹⁷。啓蒙作為文化產業與教育及現代中國文學發展的關係是其研究的重點。梅在〈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啓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啓蒙論述與國族想像〉¹⁸中以梁啓超的《少年中國說》及《新中國未來記》等為基礎，非常仔細地考察「少年」在近現代文化思想史是如何被發現，以及此過程與現代性、啓蒙論述與國族想像間的複雜關係。作者非常有洞見地指出「少年」的發現，無關乎實際的生理年齡，而更多是視「國民」心力之消長而定，從而也就使得「少年—老大」之間無法壁壘分明，可以相互流動游移。另外，文章還揭示晚清少年論述、國族想像與日本青少年論述之間的淵源。她的另一篇論文〈孩童，還是青年？——葉聖陶的教育小說與二〇年代青春／啓蒙論述的折變〉則是以「教育小說」作家葉聖陶的長篇小說《倪煥之》(1928)為基礎來分析晚清到二〇年代以來「青春／啓蒙」論述與時代語境之間的呼應關係。文章中對中國語境下的「教育小說」與西方「教育／成長／啓蒙小說」(Bildungsroman)之間的相似與區別作了辨析，尤其有意思的是作者還特別討論小說《倪煥之》中「青年」與「孩童」之間的糾葛互動。談論現代中國語境下的「教育小說」，自然離不開包天笑這個人物。在〈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¹⁹一文中，梅家玲具體考察清末民初「教育小說」的譯著情況，尤其是對包天笑教育小說中有關「教育」與「小說」間的種種糾葛作了非常仔細的研究和梳理。作者把包天笑譯著的教育小說概括為兩大類：一類著眼於學校教育，強調少年正常的成長學習歷程；一類以無父無母的「苦兒」流浪小說為主，借著主角的成長奮鬥，激勵讀者內心的激情感性。兩類小說都與教育有關，並與國族想像相連。但是，包天笑在譯著時常有不少商業方面的考量，這一點，恰恰凸顯文化出版事業中，「商業」與「啓蒙」之間的曖昧關係。

¹⁷ 梅家玲：〈孩童、還是青年？——葉聖陶教育小說與二〇年代青春／啓蒙論述的折變〉，《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2期（2006年11月），頁79-103。

¹⁸ 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啓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啓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6月），頁249-276。

¹⁹ 梅家玲：〈包天笑與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中外文學》第35卷第1期（2006年6月），頁155-183。

在與上述這些研究進行對話的基礎上，本書作者著眼於「發展」這個關鍵字，將兒童視為不平等國際體系中現代中國發展命運之困境的「固執的鏡子」(obstinate mirror) (p. 121)。如前面所提到的，他對「發展」這個詞的理解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生物學以及文學的敘事結構，而將這多種含義連接在一起的則是兒童。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有學者如 Anagnost 者已經通過對豐子愷漫畫的分析，深入地解析在中國語境當中，兒童與現代民族國家發展話語之間的複雜聯繫。而作者的獨特貢獻之一在於借助晚清吳趼人小說和魯迅小說的細讀和對童話這個文類的分析，將中國半殖民地語境下以進化論為基礎，發展話語中的內在矛盾，與這些小說回環反復和停滯不前的敘述結構相互聯繫起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書中對魯迅作品進行很深入及新穎的評析，深刻地揭示其作品中悖論式的進化思維，如何使它們成為現代教育寓言的一部分。關於進化論在近代中國的翻譯和介紹，學者已作出許多很好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思想史的框架之內。作者在這些前人研究的基礎上，著眼於進化論的思維如何借助各種大眾媒介和現代印刷文化本土化，以及它如何呈現為一種貫穿現代中國文學和文化的敘事結構，語言表現方式和特定的想像歷史的認知模式。正基於這樣的關心和理解，在各種文類當中，作者非常注重小說這種文類的考察，例如第一章對晚清冒險小說的分析以及貫穿全書對魯迅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孤獨者〉等篇的細讀。在全書的論述中，作者並不企圖寫一部面面俱到的現代中國兒童文化歷史，而是採用「橫斷面的分析法」：「我這本書引用的很多材料都是『共時性』的，來自於一九三三年；連書中分析的電影《小玩意》也都差不多出現在這個時間前後。我是有意識來截取『現代史』的一個鮮活的文化橫斷面」²⁰。

童話、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的關係

關於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發展之間的隱喻關係，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如果發展話語可以理解成被啓蒙者獲得提高的一種教育形式 (a form of pedagogy)，那現代中國文學也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被理解成某種形式的兒童文

²⁰ 安德魯·瓊斯，文貴良：〈進化論思維、魯迅與近現代中國——安德魯·瓊斯教授訪談錄〉，頁8。

學。」(p. 6) 這樣的一種關係描述，一方面很好地提醒我們一些本土資料 (vernacular materials)，例如教科書、兒童啓蒙讀物和童話等，這些經常被忽視的材料事實上和那些被經常討論的現實主義小說一樣重要且複雜地參與中國殖民現代性的兩難處境。在作者看來，兒童文學是承載進化主體最有效的形式之一。同時，啓蒙話題和其所隱含的文明開化的教育模式也讓我們意識到，事實上在國家的成熟主體面前，每個公民都是期待成熟和穩定的孩童。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從五四開始正式邁步的白話新文學，其本身的發展歷程也可以用一個孩童的成長歷程來比擬，這方面重要的例證是國語的逐漸成熟和推廣。

在兒童文學的各種類型中，作者特別關注「童話」這種文類，並且在最後一個章節對俄國作家愛羅先珂 (В.Я. Ерошенко) 童話〈狹的籠〉的討論中，大大擴展這個文類的意義，並且把它作為本書書名中所隱含的關鍵字之一。他首先把「童話」這個類型，特別是其分支之一的「教育童話」放在當時中國（半）殖民地語境裏，深入地討論和分析其作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知識分子困境的寓言。在作者看來，被視作「小說的童年」，也即故事敘述起源的童話是進化史源頭的佐證，總是與天真、原始和野獸特性相聯繫，也關涉現代中國最核心的命題：「發展」。正如在一次訪談中所說，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用童話故事來隱喻魯迅那「不太穩定，也不太確定」的文體。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書中細讀不少魯迅的雜文，例如在一開始討論的雜文〈現代史〉，在他看來就是一種「童話式寓言：篇幅雖小，卻具有嚴肅地對待哲學、歷史問題的極大容量」、「是共時性文化橫斷面」²¹。在作者看來，〈狹的籠〉是五四時期愛羅先珂寫給大人看的一則非常複雜的童話故事，包含主體與客體，殖民與被殖民的充滿張力的矛盾關係。五四時期，愛羅先珂暫居在周氏兄弟家，與魯迅和周作人兩兄弟都有密切的互動。他雖是盲人，卻同時也是作家、音樂家、無政府主義者和推動世界語的學者。他的作品在五四時期被翻譯介紹至中國，他也很快成為許多五四知識分子崇拜的偶像之一。童話是教育家對兒童乃至民族進行文明開化的重要工具。愛羅先珂和魯迅一樣持續關注進化論及其帶來的發展渴求，但也深刻懷疑這種發展的希望只是幻像。在魯迅翻譯的愛羅先珂童話，尤其是〈狹的籠〉中，作者發現二者對兒童文學的共同興趣，以及對服務革命的教育學之有效性的深刻懷疑。論文在分析這個文本時也標示童話作為一種文體，作為兒童

²¹ 同前註，頁 8。

與成人、野獸與人類、野蠻蒙昧與文明開化之間的媒介，所承載的種種矛盾訴求。最後，作者認為〈狹的籠〉提出了關於撰者的身分與主體、政治的代言和誤讀等重要問題，這些困境不僅包含在這個關於反殖民革命呼聲被篡用的寓言中，也存在於愛羅先珂的文本與其譯者的複雜關係中。在細讀魯迅的〈狹的籠〉（翻譯自愛羅先珂的創作之一，原文是愛羅先珂用日文創作）之後，作者認為，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和他們的理想，如同小說中那頭被囚禁的老虎一樣，皆需要去面對「鐵籠子」所帶來的種種束縛。所有加諸在童話上的期望，不僅最終無法實現，其背後的想法和價值最終也可能被顛覆。

關於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兒童文學」的發現及其意義，洪長泰在其著作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中有專門一章討論二、三〇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對童話和兒歌的討論及蒐集情況²²。洪長泰認為，中國民間文學家蒐集這些童話和兒歌是為了獲得更多關於兒童的思想和行為的知識，而這正好是能準確地把握兒童問題的關鍵之處。他尤其肯定這個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把純兒歌從傳統的、道德教化的、成人正統的文學中分離出來，把它重新歸入一個專門的民間文學體裁，並肯定它在民間文學教育功能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和開拓性的意義。另外，這章也對這個時期中國兒童文學的定義如何在西學的啓迪下發生變化，當時知識分子如何將童話和兒歌引進啓蒙教育並引起廣泛的爭論（如童話裏有關精怪魔鬼的故事是否會給兒童不良的影響），以及這個時期知識分子對兒童文學認知方面的缺陷等問題進行比較仔細的討論。而中國大陸學者錢理群對周氏兄弟的研究中，比較早意識到周作人對五四時期「兒童的發現」之貢獻²³，並認為五四時期周作人對兒童問題的考察與其早年在紹興時偏重國家民族繁衍的立場不同，而是轉向「人」的健全發展的角度，將兒童作為「人的發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錢也強調周作人在五四時期所進行的兒童學、童話學、神話學研究在文學觀念、藝術思維方式等方面都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具有啓發與開拓性的意義²⁴。

近年來，也有一些學者開始研究和關注五四時期個別作家的兒童文學寫作

²² Chang-tai Hung,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²³ 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2年），頁234-237。

²⁴ 錢理群：〈第四講 兒童學、童話學、神話學研究與傳統文化的反思〉，《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講》（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48-64。

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之間的關係。劉皓明的論文“From Little Savages to *hen kai pan*: Zhou Zuoren’s (1885-1968) Romanticist Impulses around 1920”仔細分析周作人早期的兒童觀如何受到浪漫主義思潮及人類學的影響²⁵。文章從分析周作人發表於一九二一年的白話小詩〈小河〉開始，從其「寓言」的形式入手（詩中包含一個完整的、虛構的，同時也是象徵性的故事），辨析周受到西方詩歌傳統的影響，體現了從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以來歐洲詩學的最基本的宗旨：作詩就是作神話 (poesis is mythopoesis)，而這與中國傳統的詩歌美學有本質上的不同。作者特別注意到周作人多採用德文詞 Märchen 而不是英文詞 fairy tale 來對應中文裏的「童話」一詞，並且由此切入來梳理周如何受安特路朗 (Andrew Lang) 進化人類學的影響。更推進一步，劉皓明認為在進化論的表面之下，周作人把小孩與野蠻人作類比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歐洲浪漫主義思潮。作者依據周作人白話詩創作的文本特點、詩作的比較及自傳材料仔細分析周在二〇年代以小孩為主題的白話詩如何受德國哲學家赫爾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和英國浪漫主義詩人 William Blake 的影響。徐蘭君的論文〈「風景的發現」與「疾病的隱喻」：冰心的《寄小讀者》(1923-1926) 與二十年代中國文學中的抒情現代性〉²⁶ 則從「風景的發現」、「疾病的隱喻」及「童心的發現」等角度來分析冰心如何把各種不同的話語，包括基督教教義、西方浪漫主義詩歌及中國傳統詩詞，融合在一起，創造出一種在她看來可以被孩子理解的情感話語。同時，徐蘭君指出，這組名義上寫給兒童的書信在當時讀者卻多是成年的青年，這個事實提醒我們，冰心所建構的「小讀者」概念不僅僅指生理意義上的兒童群體，更重要的是代表二〇年代中國還未充分發展起來的非精英普通讀者群。這個概念本身隱含著在當時非常難得的跨越社會等級差別的平等概念，而這也解釋了冰心的作品在當時備受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徐蘭君在討論中特別突出這組通信的異國寫作背景，並參考冰心留學期間創作的其他作品，以及她與其他中國留學生及美國老師的往來紀錄及其日本同學的回憶錄，來分析這組通信創作所

²⁵ Haoming Liu, “From Little Savages to *hen kai pan*: Zhou Zuoren’s (1885-1968) Romanticist Impulses around 1920,” *Asia Major* 15.1 (June 2002): 109-160.

²⁶ 拙作：〈「風景的發現」與「疾病的隱喻」：冰心的《寄小讀者》(1923-1926) 與二十年代中國文學中的抒情現代性〉，收入徐蘭君、安德魯·瓊斯 (Andrew Jones) 主編：《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 183-213。

包含的種種矛盾，尤其是其作品中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思想的糾纏，由此解釋冰心為何最後以「失敗」來解釋自己這個時期的寫作。

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有不少兒童文學史著作出版²⁷，也有許多關於兒童文學理論及歷史材料的整理和收集，這裏不一一列舉。值得一提的是 Mary Ann Farquhar 的著作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²⁸ 是目前為止英文世界研究現代中國兒童文學史僅有的一本專著。她對中國兒童文學的主要特點、這個領域的主要文本以及主要文學流派的發展變化等都有比較全面的討論。時間從十九世紀末期到文革結束。這本書討論的核心議題是兒童文學的發展與現代中國國族論述之間的關係，通過對資料的詳細考察，梳理了四、五〇年代中國革命兒童文學的發展 (revolutionary children's literature)。Farquhar 為連環畫這個兒童文學種類專門開闢一章進行討論，分析其作為革命大眾通俗文藝的一部分如何在三、四〇年代的中國興起和發展，而新中國政府又如何能在五、六〇年代對其內容、出版及發行進行控制和清理。她同時指出毛時期大眾通俗革命文藝的發展使得兒童文學逐漸被政治化和成人化而失去特色，兒童不再是一個獨立性的讀者群，而被納入成人的範疇中。另外，她也非常關注二〇年代關於兒童與兒童文學的思想在之後幾個時期的演變。例如他很重視「童話」在各個不同時期的寫作情況及其特點，尤其是這種文類在五、六〇年代的遭遇。

²⁷ 蔣風主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石家莊：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1987年）；蔣風主編：《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石家莊：河北少年兒童出版社，1991年）；張香還：《中國兒童文學史（現代部分）》（杭州：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1988年）；張之偉：《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稿》（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蔣風、韓進：《中國兒童文學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孫建江：《二十世紀中國兒童文學導論》（南京：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1998年）；吳其南：《中國童話史》（石家莊：河北兒童出版社，1992年）；金燕玉：《中國童話史》（南京：江蘇少年兒童出版社，1992年）、洪汎濤：《童話學》（臺北：富春出版社，1989年）。高校文科教材則有蔣風：《兒童文學概論》（長沙：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1982年）；蔣風主編：《兒童文學教程》（太原：希望出版社，1993年）；浦漫汀主編：《兒童文學教程》（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1-2000年）等。

²⁸ Mary Ann Farquhar,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 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 (Armonk, N.Y.: M.E. Sharpe, 1999).

關於晚清和民國時期童蒙教育與教科書編撰

晚清時期對現代中國兒童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具有非常關鍵的的意義。胡從經於八〇年代撰寫的《晚清兒童文學鉤沉》對晚清兒童文學及文化的原始資料收集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在西潮激蕩之下，晚清時期的「知識結構」面臨巨大的衝擊與調整。這幾年來，近現代報刊、教科書的編撰史與晚清的童蒙教育逐漸成爲大家關注和研究的重點。白莉民的英文專著 *Shaping the Ideal Child: Children and Their Prim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對晚清時期的教育改革作了一些有意思的討論²⁹。本書對古代中國被廣泛傳播和使用的教材作了系統的研究，從而考察傳統中國教科書的歷史、早期中國對童年的理解以及歷史上圍繞著兒童教育的改革運動。她分析這些教材的內容，討論中國兒童除了傳統的四書五經之外，如何接觸、學習幾何與歷史等科目，從而對中國語境下兒童的道德培養及社會自然環境對兒童健康成長的影響，這兩個方面作了仔細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的第八章討論了以梁啓超爲代表的晚清學者在外強侵入中國的背景下爲建立現代教育改革制度的種種設想及努力，並仔細分析梁啓超如何企圖結合中西教育特點發展出新的兒童教育課程。

季家珍 (Joan Judge) 在〈改造國家——晚清的教科書和國民讀本〉中通過分析晚清新出版的一些教科書和國民讀本呈現教育、文化與政治改造之間的關係³⁰。她主要集中討論三類不同的教材：初等小學修身教科書、國民必讀和女子教科書，其重點在於討論晚清知識分子如何在這些教科書的編撰中提倡新國家與新國民的理想。修身、教育與國族主義之間的關聯在文章中得到了清晰地呈現。中國社科院畢苑的專書《建造常識：教科書與近代中國文化轉型》清晰細緻地梳理中國近代教科書的形成和成熟的過程，以及教科書對當時文化轉型所產生的影響³¹。她對晚清時期近代教科書編審制度的演變，及其對近代國民意識的形成以及科學觀念的培養進行重點分析。夏曉虹的論文〈《蒙學課本》中的舊學新知〉從《蒙學課本》的存世版本考辨入手，釐清前人與今人記述中

²⁹ Limin Bai, *Shaping the Ideal Child: Children and Their Prim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³⁰ 季家珍 (Joan Judge) 著，孫慧敏譯：〈改造國家——晚清的教科書與國民讀本〉，《新史學》第 12 卷第 2 期（2001 年 6 月），頁 1-40。

³¹ 畢苑：《建造常識：教科書與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年）。

的各種錯誤，進而探討一八九七年版與一九〇一年版通過的〈編輯大意〉以及課文本身所呈現出晚清教科書編纂者的教育理念與新知識觀³²。整篇論文資料翔實，考證仔細，從《蒙學課本》的編訂與修正的辨析中分析有關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反省、科學常識的普及、道德規條的灌輸、中西資源的配置以及對新學書刊的即時吸納等重要問題，從而揭示西學是如何借助新式學堂的課程教育進入中國人的知識結構。美國學者韓嵩文 (Michael Gibbs Hill) 在其關於林紓研究的英文專著中³³，特別開闢一個章節討論林紓從古文家轉變為現代知識分子角色中，如何在近代教科書的編撰中發揮重要角色。在作者看來，林紓以編輯國文教科書的方式參與新文化運動。民國時期教科書研究的另一個重點是白話文和國語的教育及推廣與中小學現代教科書編寫之間的關係³⁴。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一書中則注意到民國時期上海啓蒙產業的興起，並對教科書與兒童讀物的大量出版如何成為「上海摩登」的一部分作了很好的梳理和分析³⁵。

關於「商業」和「啓蒙」之間的錯綜關係，除了對民國時期兒童刊物的研究之外，另一個受到關注的典型對象就是玩具。從玩具的角度去分析討論民國時期兒童是如何被對待、現代「遊戲」觀念的發展以及相關兒童產業的興起是近年來新的研究方向。本書作者在“The Child as History in Republican China: A Discourse on Development”一章中談到國貨運動，而孩子也被視為「國貨」之一。通過對當時「啓蒙工業」之一的教科書出版業和玩具產業的關注，他解析兒童作為一個消費群體是如何以「啓蒙」的名義被建構出來。書中他還特別開闢一節去討論三〇年代的電影《小玩意》中所隱含兒童的現代化教育與中國民族工商業（電影中是玩具產業）發展之間的糾結。討論中，作者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如何去理解民國時期上海百貨公司裏的人形玩偶，在許多時候比現

³² 夏曉虹：《〈蒙學課本〉中的舊學新知》，收入徐蘭君，安德魯·瓊斯主編：《兒童的發現——現代中國文學及文化中的兒童問題》，頁 1-34。

³³ Michael Gibbs Hill, *Lin Shu, Inc.: The Making of an Ic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³⁴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 Robert Culp, “Teaching Baihua: Textbook Publishing and the Production of Vernacular Language and a New Literary Can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4.1 (November 2008): 4-41。

³⁵ Leo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此外 Christopher A. Reed 在其專著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一書中也有相關的討論。

實生活中貧困兒童的出賣價格還高？兒童與商品之間價值不平衡的弔詭，是作者討論半殖民地語境下中國民族經濟「發展」之困境的有效切入點，而與之相關的「玩具」則將我們之前所討論的兒童教育與國家經濟發展之間建立起最直接的連結。近來已經有一些文章及博士論文專門討論玩具產業在民國時期的產生及發展。Susan R. Fernsebner 在二〇〇三年所寫的論文“A People’s Playthings: Toys, Childhood, and Chinese Identity, 1909-1933”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對民國時期中國的玩具，尤其是消費方面作了很好的探索，她深入地討論中國知識分子如何把現代中國玩具的製作與國族的命運、現代新中國兒童的產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³⁶。Valentina Boretti 在二〇〇七年完成的博士論文“Playing for Keeps: The Toy Culture in China, 1895-1949”則集中深入地分析中國現代化進程如何影響和促進，同時也融入在對玩具的理解、生產和使用的過程，尤其是玩具如何有助於培養中國的新一代國民³⁷。作者除了討論中國近現代教育家及改革家是如何重新看待玩具對教育新一代國民的重要性以外，還以翔實的資料考察當時中國工商界如何介入這個產業的過程。也正因如此，玩具成爲各種不同勢力妥協與利用的對象：商人利用有關現代玩具的各種話語來爲自己的利潤服務；手工製作者以外國玩具爲模仿對象來改進自己的產品；這些製造者回應並且利用這個新的兒童文化來推動自己產品的研製及流通。在這個時期，從玩具的生產和傳播與國家的生存及尊嚴到工業的現代化等諸多議題都有關聯。論文最後還分析玩具文化裏的性別問題。

餘 緒

本書主要集中在晚清與民國時期，但正如作者一開始提到的，「發展」的話題一直到當下的中國還是一個核心的問題。因此，我們不禁要問：作者在書中所考察的這些課題在之後的戰爭時期、戰後時期，還有五〇到七〇年代的毛澤東時期和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又有怎樣的發展和變化？跨越中國大陸地區的界限，從民國一直到現在，中國兒童文化的發展又如何與亞洲其他地區的兒童

³⁶ Susan R. Fernsebner, “A People’s Playthings: Toys, Childhood, and Chinese Identity, 1909-1933,” *Postcolonial Studies* 6.3 (November 2003): 269-293.

³⁷ Valentina Boretti, “Playing for Keeps: The Toy Culture in China, 1895-1949” (Ph. D. diss.,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in University of London, 2007).

文化互動？例如臺灣學者游佩芸的《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在紮實的材料梳理和分析上，考察日治時期(1895-1945)臺灣兒童文化的狀況，探討殖民地兒童文化中所包含的民族與語言的議題，並且分析當時中日兩地兒童文化工作者之間的密切互動³⁸。除了殖民地時期，另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是冷戰時期，亞洲不同地區之間在兒童文化上的相互聯繫。從兒童史的角度考察整個東亞文化史是近來非常值得注意的新方向。在此跨國視野下比較分析中國的兒童文化與同一時期亞洲其它國家和地區之間的聯繫，必定有許多新穎且有意思的發現。另外，本書也讓我們想進一步考察兒童文化中的性別問題。在討論周作人時，作者提及周所推薦的很多讀物都是偏向男孩，而其他學者的研究也表明在晚清時期提倡的少年冒險小說多數也是以男孩為主³⁹。如何看待性別話題與兒童話題在探討中國現代性問題上的交集，值得進一步思考和分析。

³⁸ 游佩芸：《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臺北：玉山社，2007年)。

³⁹ 關詩珮：〈哈葛得少男文學 (boy literature) 與林紓少年文學 (juvenile literature)：殖民主義與晚清中國國族觀念的建立〉，收入王宏志主編：《翻譯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輯，頁138-169。